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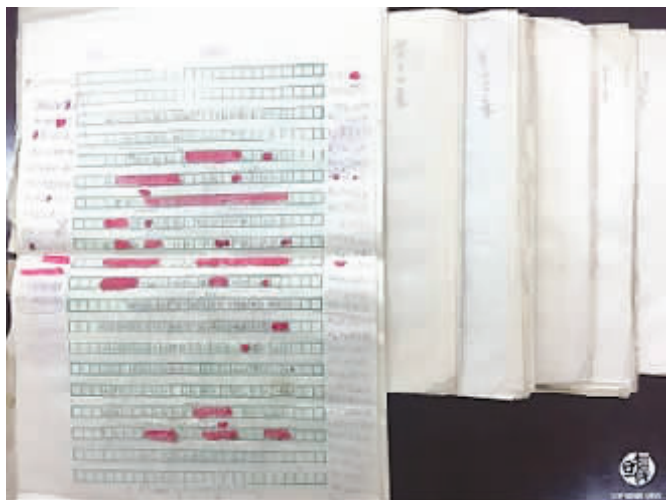
跨界耕耘、通俗传播、“不断改悔”的蒋学模

林木西

本文通过全面回顾蒋学模教授一生的学术经历——大学毕业后从学术编译工作起步，如何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执着研究，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传播上所取得成就，将蒋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翻译家、“经济学领域永远的‘基督山伯爵’”；在“红色摇篮”深造、“红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感谢复旦大学的邀请，让我有幸参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邀请者要我选择一个方面或者一个角度谈谈蒋学模教授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这不禁使我联想到去年 10 月 20 日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举行的“宋则行经济思想国际研讨会”和 12 月 9 日在辽宁大学举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宋则行教授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蒋、宋两位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年龄上宋则行教授是 1917 年 10 月 1 日出生，蒋学模教授是 1918 年 3 月 24 日出生，而且我发现，两位先生在研究领域、治学之路乃至对学生的态度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此，我去年写了一篇纪念恩师的文章，题目是“学贯中西、‘史学论’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经过认真思考，我今天要写的题目是“跨界耕耘、通俗传播、‘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蒋学模”。

蒋、宋两位大师是多年的挚友，而且宋先生与上海、与复旦有着不解之缘。宋先生与蒋先生的经历有很多相似点：宋先生是上海崇明人，父亲毕业于复旦商科，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工厂会计，后家道中落，经常失业，宋先生中学时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好，本欲报考清华，但迫于家境，1935 年改考全部官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经济系，1939 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蒋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也称“三北人”），父亲是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职员，曾因算错一笔账险些失业，1941 年毕业后也曾任在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任编译。宋先生 1948 年创



↑ 蒋学模《政治经济学》第一版手稿。
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提供



→ 蒋学模翻译的《基督山伯爵》多次再版，左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封面。

桥学成回国，曾在上海主编《经济评论》杂志，1949 年 3—4 月在白色恐怖下被迫停刊；蒋先生曾在香港《财政评论》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译，1944 年进《文摘》社工作，1948 年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停刊。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复旦大学曾聘请宋先生任工商管理系主任，但被他婉言谢绝，9 月随东北财经委员会招聘团赴东北统计局工作，此后在东北扎下根，并长期在辽宁大学工作。即便如此，他与复旦大学和上海的许多著名教授如蒋学模先生、宋承先先生（人称西方经济学领域“南北二宋”）、洪文达先生等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和学术交往，与雍文远先生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而且影响到辽大的学子。[宋则行 1941 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即“南开第五届”），雍文远为第

七届（1943 年），宋承先为第九届（1945 年）；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曾共同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试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9 月版），参加编写的还有夏光华、王志平、王爱珠、陈伯庚、李鸿江等，1964 年再版后再未出版；宋先生曾为雍先生专门写过一本书评：《评〈社会必要产品论〉》（《经济研究》1986 年第 12 期）]我本人 1983 年赴厦大参加《资本论》研讨会，第一次途经上海，到复旦拜访的就是我的师兄、蒋先生的研究生乔刚。与蒋先生要求其弟子一样，在撰写论文时，宋先生也让我们去北图、社科院经济所查资料。我为撰写博士论文，曾在经济所的地下室里查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复印回一大批外文文献。所以，当我看到蒋先生的一些

材料，不禁联想到我的导师宋则行教授。

我觉得，蒋先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有以下特点：

作为翻译家、“经济学领域永远的‘基督山伯爵’”

我最早“结识”蒋先生不是在大学里，而是通过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和电视剧《基督山伯爵》。当时主要是读小说、看电视，没留意译者，更没有把这同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的大名联系在一起。后来在与同学的议论中得知这一情况，使我感到特别惊奇。用现在的话来说，蒋先生的这一“跨界”跨得有点大了。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翻译学术著作不在少数，虽然也可以叫做翻译家，毕竟是在经济学领域。但一步跨到文学界，特别是用英语翻译法国著名作家的经典小说，蒋先生可谓第一人，而且这一跨就是 60 余年，受众数以千万。后来我又了解到，蒋先生解放前并没有出国经历，本人并非英语专业毕业，能取得如此成就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不仅如此，通过阅读《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第三辑）（以下简称《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8 页），我还发现，蒋先生的译著不止《基督山伯爵》（又名《基督山恩仇记》，上海文摘出版社，1946 年版）这一部，还有《保卫察里津》（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41 年版）、《希特勒征服欧洲》（重庆大时代出版社，1941 年版）、《人与地》（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46 年版）、《俄罗斯最后到来的巨人》（上海文摘出版社，1949 年版）和《捷克的工业国有化》（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 年版），共六部。因此，用“跨界耕耘”来形

容蒋先生这方面的贡献，似不为过。

在“红色摇篮”深造、“红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与宋则行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样，蒋学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和渴望最初也来自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点：一是来自从高中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二是来自读书，主要得益于他哥哥蒋学楷（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系学生，后在香港被日军枪杀）。开始时主要读的是社会学方面的通俗读物《社会学 ABC》，后来读的是能够接触到的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由此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初步认识。1936 年报考苏州东吴大学经济系，抗战期间到成都借读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41 年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1945 年起，在复旦大学文摘社担任编辑，自 1949 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最初开设“苏联经济建设”和“东南欧经济”两门新课，不久转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

在当时，能够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无疑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充分体现了组织上的信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宋则行 1952 年调到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前身）工作，最初也是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后来由于在剑桥学习的“历史问题”、“特嫌”被剥夺这一权利，改为从事经济史研究（由此成就其在全国外